

# 批评视角：我国解构主义翻译研究的本土化进程

刘全福

(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 上海 200083)

**摘要:**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以降, 国内译界陆续有人撰文对解构主义的翻译思想进行引介与评述。经过众多学者拓荒似的工作, 翻译研究的解构途径业已成为人们熟稔的话题。然而, 在解构主义翻译研究的本土化过程中, 国内译界出现了两种对峙的态度与观点。此外, 近几年来, 主次颠倒、简单搬运、盲目嫁接、以偏赅全、断章取义、不求甚解等倾向屡见不鲜。通过对若干相关论文的归整与分析, 本文试就 10 余年来我国解构主义翻译研究本土化过程中出现的理性与非理性现象进行详细的梳理与分析。

**关键词:** 解构主义; 翻译研究; 本土化

**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722X (2010) 01-0051-06

## 0 引言

2004 年《学术研究》上刊载了《德里达的解构翻译理论初探》一文, 文中有这样一段述评: “奇怪的是, 德里达的解构主义风行中国大陆近 20 年, 但国内翻译界对德里达的翻译理论却异乎寻常地保持沉默, 这无疑是一种无言的拒斥”。(黄汉平, 2004) 此言可谓差矣: 专著一面姑且不论, 自 1995 年首篇介绍解构主义翻译思想的文章问世以来, 国内各大要刊所载相关文献早已是汗牛充栋, 解构主义之于我国译界的影响实可谓荦荦大者, 由是观之, “沉默”或“拒斥”一说显然有悖于事实。这一现象表明, 尽管解构主义翻译观早已在我国译坛亮相, 且日渐呈现出不可遏制的“红火”势头, 尚未窥见其发展脉络及影响者抑或有之, 事实上, 即使到了今天, 4 年前的情况依然属实。鉴于此, 本文拟对国内业已付梓的若干篇论文详加梳理与规整, 并就解构主义翻译思想在中国语境中的本土化进程进行全面的综述、剖析与批评。

### 1. 登场: 夹缝中的命运

1995 年岁末, 《外语教学与研究》推出了蒋晓华的题为《解构主义翻译观探析》的文章(下称《探析》)。文中较为详细地介绍了德里达的解构思想, 并对本雅明的《译者的任务》(*The Task of the Translator*)一文进行了要言不烦的解读。一般认

为, 从源头上讲, 解构主义翻译观即滥觞于本氏的这篇译序, 因此可以认为, 作为我国解构主义翻译研究本土化进程的开先河者, 《探析》的作者正可谓切中了要害。

从时间上看, 《探析》的付梓要比德里达的《巴别塔之旅》(*Des Tours de Babel*) 迟到十几个年头。当翻译的解构途径早已在西方译坛问世且影响荦荦之际, 国内译界终于嗅到了一丝解构之风的气息, 就此而言, 《探析》这只姗姗来迟的“春燕”该是为“困顿已久”的国内译坛送来一阵具有祛除力似的清风了。然而, 事实并非如此, 当时并没有出现应者如潮的场面, 三载之间, 回应者仅年均一例, 今天看来, 这种一致的冷漠与“无言的拒斥”实在是难以索解。

作为回应, 王守仁的《谈翻译的忠实——读本雅明论译者的任务》一文于 1996 年付梓, 文中破天荒地运用本氏的“纯语言”(pure language)概念对传统意义上的“忠实”翻译标准进行了彻底的解构: 传统译论奉“忠实”为圭臬, 假想意义完全能够从原文中剥离并进入译文, 而本雅明则不以为然, 认为译文与原著之间并无“忠实”可言、翻译不应追求意义对等云云。此言可谓惊世骇俗, 而作者的结论也同样语出不凡: 本雅明解构了原作, 也就从根本上动摇了“忠实”原则的基础, 而“唯

收稿日期: 2008-12-01

基金项目: 上海外国语大学规划基金项目 (2008114008)

作者简介: 刘全福 (1961-), 男, 河南汝南人, 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教授, 博士, 研究方向为翻译理论与实践及当代西方文论。

有打破原著意思可以完整转移的神话，才能使译文和译者获得应有的尊重”。

当下而言，本雅明的翻译观大家已不陌生：译者的任务不是对原文意义进行复制，而是通过对“意指方式”（mode of intention）的迻译释放出所谓的“纯语言”，从而使原作获得一种“嗣后的生命”（after-life）。本雅明的翻译思想带有明显的宗教救赎意味，他试图要通过翻译寻找或拯救一种超越真理的理念，这种理念不是意义本身，而是纯粹直译的语言形式。不消说，本雅明是在语言或宗教哲学的平台上对翻译进行操作的，这与翻译的本体相去甚远，难怪他的那篇译序直到半个世纪后才被德里达发掘出来。尽管如此，对于本雅明的上述观点与思想，上文作者还是采取了全面拥抱的态度。

这里我们看到了一种颇值得玩味的现象：在我国译界，解构主义翻译观的本土化研究似乎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在两种态度的夹缝里求生。在《探析》中，作者明显采取了客观的保留态度：解构主义的翻译观虽不乏某些思想上的启迪作用，却也不无诸多消极影响，比如它强调原文意义的相对性，提倡译者诠释的主体性，所有这些都难免造成种种妄加曲解现象的泛滥，并最终让解构主义翻译理论陷入混乱。（蒋晓华，1995）而在上文中，作者基本上采取了全盘接受的态度。两种迥异的态度无疑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而这一点在下文中还将会被提及。

一年后，另一篇回应文章在《外国语》上刊出，文中对德里达及其解构主义翻译思想进行了更为全面的介绍：原文取决于译文，原文的生命取决于译文的特性，文本本身的意义是由译文而不是由原文所决定的。（刘军平，1997）就态度而言，作者也采取了绝对认同的观点，指出“译界中人确实应当接受德里达的鼓动，对翻译理论的形而上学基础做认真的清理工作”，并进而由此检讨翻译理论的决定论，诸如原本文本质中心论等，同时“转而正视解构主义本身给翻译带来的巨大魅力”，只有这样才能带来翻译研究的真正转向。（刘军平，1997）

我们知道，作为一门综合性交叉学科，翻译学问题的探讨每每需要对所跨学科的本体理论进行连篇累牍的诠释，从中可以明显地看到研究者无可奈何的心态：唯恐落入“两张皮”的境地，却又常常深陷其中而不能自拔。鉴于解构主义与翻译研究均具有自身的复杂性，将两者加以“杂合”（hybridization）必然会使研究者的进退空间更为狭小。如在翌年发表的《解构主义与翻译理论》（王一多，1998）一文中，作者首先就不得不对解构主义理论

本身进行细读，一路颠簸到正题，剩下的只有草草结论的时间了：“解构主义翻译观在对传统进行反叛时，彻底否认秩序、体系、权威、中心，主张变化、消解、差异，这很容易产生误导而使人无所适从”。此外，同解构主义一样，解构主义翻译研究也极易陷入自我解构的悖谬之中，如上文作者接着指出：“我们在汲取解构主义翻译观独特且合理的一面之时，不可取其极端而走向虚无”。问题的症结是，既然解构主义彻底否定了秩序等翻译赖以存在的一切根基，其“合理的一面”又从何谈起？

## 2 交锋：第一次冲突

1999年，国内解构主义翻译研究迎来了一次小小的高潮。是年有3篇同类文章问世，这里主要关注其中两篇，用以展示翻译的解构途径在本土化进程中的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第一次交锋。

对峙的一方首先推出了《跨越文本的障碍——解构主义对翻译学理论的启示》（何加红，1999）一文。应当承认，文章标题本身并无不当，我们倒真的期望能够从解构主义那里汲取某种富有洞见的“启示”。然而刚入正题，就令人大惑不解了：“从理论上讲，以‘信、达、雅’为代表的传统翻译理论实际上所代表的只是一种比较陈旧的阅读观念”。谓“信、达、雅”陈旧当时已不甚稀奇，但传统译论何以摇身成了“陈旧的阅读理论”？这里显然出现了概念错位问题：阅读与翻译本属于两种不同的认知活动。按照作者的观点，现代释义学等早已将文本还原论彻底清除，从而为现代翻译学理论的建构扫清了屏障，而我们则认为，现代释义学并非只是伽达默尔（H. G. Gadamer）的一家之言，除此之外，尚有赫施（E. D. Hirsch）的“含义-意义”（significance-meaning）理论以及艾柯（Umberto Eco）的“作品意图”（intentio operis）、“标准读者”（model reader）等理念。作者又说：“钱钟书先生所提出的‘化境’之说……与解构主义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处，它至少在一个意义上向我们表明了翻译已将原文本义消解进它自身的活动之中。”需要指出的是，“化境”与解构主义是否有“异曲同工之处”，问题还在于能否在两者之间建立理据充分的联系。钱钟书的“化境”理论已阐述得十分清楚了，这里毋庸赘言；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翻译观也可谓够“清楚”了，同样无需多言，但无论如何，我们实在难以从两者之间找出多少“异曲同工之处”。最后，关于“化境”“已将原文本义消解进它自身的活动之中”一说，此类解构式的行话与噱头恐怕连钱钟书本人也难以释怀。

因此可以这样说，当时假如没有《论解构主义翻译思想》(郭建中，1999)一文全面、客观且充满思辨的理性分析，我国的解构主义翻译研究抑或会朝着极端非理性的方向发展，亦未可知。作者指出：翻译的任务首先要重现原文意义，而解构主义翻译观则完全是背道而驰的。文章对解构主义所谓原文依靠译文而存活的观点也进行了理性的诠释：没有不断更新的译文就不会有读者，因而原文也就无法存在下去了，如果后来出现了更好的译本，作品又会获得新的生命。这种解释既不悖于本来的意旨，又做到了通俗易懂，从而体现了本体论意义上解释的有效性：既认同解构主义翻译思想不乏有限的启发性，又对该理论中某些极端的观点提出了理据充分的批评，如否认意义确定性、颠覆作者权威性、一厢情愿地宣判作者与原文彻底死亡。凡此等等，均会对翻译实践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一句话：解构主义在抹煞译文与原文区别的同时也将翻译本身一笔勾销。

对于解构主义翻译研究本土化进程中的非理性倾向，上述文章不啻是一副镇静剂，也正因如此，新千年伊始的中国就显得冷静多了，是岁只刊出了《韦努蒂及其解构主义的翻译策略》(郭建中，2000)一篇文章。严格地说，韦努蒂(Lawrence Venuti)并不一定非要迁就于解构主义的麾下，更为确切地说，在其杂合的理论体系中，解构充其量只属于方法论的问题。韦氏所关注的主要是“后殖民”(post-colonial)语境下翻译的整体命运，也即反对“归化”(domestication)、主张“异化”(foreignization)的“抵抗式翻译”(resistant translation)，“抵抗”的对象是目的语文化的“民族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韦努蒂的“隐形”(invisibility)、“显形”(visibility)、“透明性”(transparency)、“意识形态”(ideology)与“诗学”(poetics)等概念也许可以在解构主义翻译理论中加以例证或反证，但总体看来，将其置入整个后现代的大背景下进行考察应该更为确当。关于韦努蒂翻译思想的归属问题，蒋晓华等(2007)已与上文作者进行过详细商榷，这里不再赘言。

### 3 反思：从消解到重构

新千年伊始，4篇与解构主义翻译研究有关的文章相继问世，这里主要对《从德里达的翻译思想看理性主义的翻译理论建构》(蔡新乐，2001)一文进行介绍。文章作者采用了以解构消解的手法，指出德里达总在试图解构一切，但却从来不解构自身，尽管其解构式分析不过是建构式合成的翻版。

事实上，德里达同奈达并无二致，都是在为翻译寻找某种永恒的理念，或者说都在表达一种“……中心论”的观念，只不过途径恰恰相反罢了。应当承认，尽管文章行文风格稍显艰深，但我们还是能够从中领悟到作者力拒解构主义翻译观这一意图的：“对翻译的探索，有必要反思德里达的解构论，否则在‘异延’的作用下，翻译将不再可能传达任何意义”，换言之，假若“译之所译永远推迟到来”，我们的文化或跨文化建构无疑将化为空中楼阁。不难看出，与业已发表的同类文章相比，此文显然多了一些反思成分，或不妨这样说，作者对于解构主义翻译观的消解实际上也就是对传统与理性的回归与重建。

时隔一年，两篇格调迥异的文章同时刊登出来。在《走出封闭 迈向多元——谈解构主义及其对翻译研究的影响》(方灿，2002)一文中，作者热情洋溢地赞扬了解构主义之于翻译理论与实践的“推动作用”：它冲击了传统译论的封闭、静止、自足、确定等原则，冲击了“忠实”“通顺”原则，尤其是“作者之死”赋予了译者前所未有的阐释权，而正是在解构主义的启发下，才促使了当代西方翻译学作为独立学科的建立。我们认为这里有两点值得商榷：第一，在解构主义那里，“作者之死”只能是一厢情愿的说辞，因为作者并没有真正死去，作者已将鲜活的意义付诸于作品，作者的生命体征可见于任何一次活生生的叙事过程，解构主义专横地将作者“置于死地”却让译者“而后生”，这显然是一种有悖于伦理的行为；第二，翻译的传承至少可以追溯到古罗马以前，解构主义的问世不过是近30来年的事，因此，翻译学的建立应该是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解构主义与翻译研究充其量只能是一种“或然的关系”(probability)，鉴于此，将翻译学的建立完全归功于解构主义的启发显然有言过其实之嫌。

应当指出的是，在我国，对于解构主义翻译观的理性反思与重构总是发生在非理性消解或拆解即将走向极端的关键时刻。就在2002年10月，吕俊教授付梓了《翻译学应从解构主义那里学些什么》一文，文章以独特的视角对解构主义的翻译思想进行了“三要三不要”的重构性反思。早于一年前，吕俊教授也曾从侧面肯定过解构主义之于翻译研究可能产生的积极影响，然而时隔不久，他很快就敏锐地意识到解构主义的本质特征决定了它对翻译研究更可能产生误导作用，于是又撰文对翻译即改写、翻译即背叛、翻译即解构等种种过激的倾向提

出了批评。(吕俊, 2001)而在一年后的这篇文章中,吕俊更是明确了自己的观点,指出我国前一时期的翻译研究忽略了解构主义的重构性特征,而只看到其破坏、消解与否定的一面,“这与建立翻译学的目的是背道而驰的”。他接着指出,我们应该借鉴解构主义的“重构性”实质,学习其独特的思维范式及其多元的开放性思想,运用开放的思维方法发现并解决问题,从而开拓多元、开放的翻译研究向度。基于这样的反思,他指出了解构主义翻译研究本土化进程中应该力避的几种倾向:一是不应把在解构过程中发现的潜意识变成显意识,而应将潜意识创造置于显意识忠实的监控之下;二是不应把解构当成目的,拆解后的重构才是最终旨归;三是不应把非理性当成理性,解构可以非理性为主要任务,而建构则必须就于理性之范。与蔡新乐教授相比,吕俊教授更为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反思意图,其建构性意义是显而易见的。以“解构”一词为例,当时人们大都忽略了该词所固有的保守或保留的一面,也即消解(de-)传统并不意味着彻底“摧毁”(destruction),否则随后的“建构”(construction)或“重构”(reconstruction)对象势必将成为空中楼阁。

由此可见,在我国解构主义翻译研究本土化进程中,非理性的一方总是先声夺人地试图将一切传统的翻译观念消解殆尽,其基本观点是:意义是不确定的,原义其实并不存在,因此,翻译完全可以不忠实于原文。然而另一方面,面对这种矫枉过正的非理性现象,理性的一方始终都在尽力维持着一种平衡:消解是必要的,但并非终极目标,解构的目的在于重构,而重构必须基于对传统的承接。

#### 4. 较量:再度走向极端

遗憾的是,上述两位作者的努力并没有能够祛除解构主义翻译研究本土化进程中的非理性因素,两种迥异的态度还将再次较量并走向对峙的极端。

2003年,照例又有若干篇以翻译与解构为主题的论文面世,其中持绝对褒扬态度者仍不乏其人。如有作者指出,解构主义视阈内的翻译文学研究不仅为我们探究文化误读的原因提供了合理的解释力,而且也给我们认识文化误读在比较文学中的积极作用打开了一扇窗;文学翻译和翻译文学中交织着正读与误读、正译与误译的矛盾,而误读和误译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也有助于跨文化的交流、文学建构和文化运动。(魏家海, 2003)与前期研究相比,这里又出现了“误读”“误译”等新话题,但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解读“误读”与“误译”等现

象时运用了解构的策略,而并非传统的途径。

我们认为,“误读”可分为被动与主动两类,前者是无意的,与读者的知识水平有关;后者是有意的,涉及到伦理方面的问题。解构式的主动误读以借尸还魂的手法将个人意志强加于他者,显然是有悖于伦理的非理性行为。事实上,无论是阅读还是翻译,“误读”从来就不是主流现象。此外,随着社会的发展与人们认识水平的深化,某些被动的“误读”终究会得以匡正,而作为特定历史时期个别案例的主动误读也同样总是一种边缘现象,被“改写”的异质文化终究要经历再度“改写”而回归其本来面目。

2004年是解构主义翻译观引入我国的第十个年头,而这一年也真可以称得上硕果累累:8篇论文不仅在数量上前所未有,讨论范围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拓展,这其中既有实证性的研究,又不乏视角新颖的理论探讨,即使是某些重复性研究也于认识上达到了新的高度。

当然,仍不乏某些偏激的观点,如对钱钟书“化境”一说的消解即是典型例子:钱氏认为林纾前期的翻译是成功的,这对以“信”为首要标准的传统翻译观无疑是一个强烈的挑战。因此,从钱钟书的翻译思想到德里达的翻译理论,我们至少可以得到这样一个深刻启示:翻译其实大可不必在所谓的原文和译文之间自设二元对立的界限和等级。(黄汉平, 2004)此言有过激之处,明眼人一看便知:一个不懂外文的“翻译家”即使想忠于原作,又何以能够做到?而既然与忠实无缘,又何以能够对“忠实”带来强烈挑战?事实上,在《林纾的翻译》一文中,作者对林译的贬低要远远多于褒扬,假如再参照下面一段话,钱氏对于林译的态度就更为明朗了:“故译诗者而不深解异国原文,或赁目于他人,或红纱笼己眼,势必如《淮南子·主术训》所谓:‘瞽师有以言白黑,无以知白黑’,勿辨所译诗之原文是佳是恶”。(钱钟书, 1996: 373)我们认为,原文和译文之间的二元对立等级关系是必然存在的,原创性与衍生性之间不一定构成对立关系,但等级关系却是无法否认的。此外,将“化境”思想与解构主义进行杂合,也是一种拉郎配的取道。可以这样说,以解构的手段将“化境”思想与“忠实”这一传统的翻译标准对立起来,此种做法已再一次将我国的解构主义翻译研究推向了非理性的极端。

与此同时,我们也一如既往地听到了对峙的声音:解构主义拒绝任何翻译标准,其否定一切的实质就是无政府主义在学术研究领域的猖獗;理智的

人们不要为海妖动听的歌声所迷惑，盲目地跟随终究会落得船破人也毁。(唐述宗，2004)作者如此措辞是否妥帖，这里不便妄加品评，但我们至少可以进行如下猜测：作者也许是一位身体力行的翻译实践者，因而不敢苟同“翻译是被一个神话所神话了的翻译”或“忠实是一个被无数翻译者们崇拜的图腾”(王东风，2004)；他也许同绝大多数译者一样被人不屑地称为“对‘忠实’的翻译原则坚信不移”并“执著地追求着这一翻译的最高理想”之流(王东风，2004)；他虽然也知道翻译中绝对的“忠实”难以企及，并承认“不忠是绝对的”(王东风，2004)，但却依然执著于尊重并维护原作者名分这一伦理信条。总之，他不愿看到自己“坚信不移”的“忠实”标准被无端地肢解成碎片，因为一旦承认了“忠实神话的终结”(王东风，2004)，他就再也无法守住翻译所以为翻译的底线，笔下产出的也就有可能沦为“因为混乱而被‘混乱’所翻译”的翻译(王东风，2004)。

## 5. 结语

上述研究表明，10余年来，在以本土化为取向的解构主义翻译研究中，国内译界始终存在着两种对峙的观点。就非理性现象产生的根源而言，吕俊教授已进行过透彻的分析，除此之外，尚有主次颠倒、简单搬运、盲目嫁接、以偏赅全、断章取义、不求甚解等种种倾向。更为甚者，上述现象常常会造成广泛的负面影响，下面以“不求甚解”所导致的大面积“误读”与“误解”为例对德里达的 relevant translation (关联翻译；确当翻译)概念稍事分析。有学者指出：“应该说，德里达并不反对标准，他所规定的上述标准显然是一种很高的甚至是一种理想化的标准。”(王宁，2005)这里明显出现了误读：德里达虽然运用许多限定词的最高级形式对“关联的”(“确当的”)或“好的”翻译进行了界定，但正如韦努蒂(Venuti, 2001)和戴维斯(Davis, 2004: 98-99)所言，其目的显然在于对传统的翻译标准进行质疑或消解。由此可见，“上述标准”并不是德里达规定的，因为在他的词典里从来就没有“标准”二字，事实上，这样的标准正是他要解构的对象。关于这一点，曼迪(Jeremy Munday, 2001)曾经指出：德里达虽然没有直言，他所批评的其实就是格特(Emst-August Gutt)的关联翻译概念，其原因是，在德里达看来，“关联的”译文是一种完全透明的翻译，是建立在“能指-所指”稳定关系之上的。因此可以认定，德里达不可能制订“一种理想化的标准”。

上述一类的误读现象实可谓屡见不鲜。比如另一位作者在引用德里达为“确当翻译”所下的定义后指出：“从这个定义可以看出，原文在德里达的理论中绝非处于边缘位置，而是占据了中心位置；译者的任务就是要为原文找到最确当的对等词。”(金兵，2006)这种解释显然也同样违背了德里达的初衷，因为“对等”以及如此多的“最高级”所表达的绝对概念正是解构主义所要消解的对象。此外，还有人在谈到解构主义翻译观之于外语教学的启示时指出：德里达将“确当的翻译”定义为“‘好的’翻译，也即人们所期待的那种翻译”，因此，“翻译教学中应指导学生跳出语言形式的束缚，在对意义的追踪过程中，使译文努力达到‘确当’”。为此，作者还举了不少例子加以说明，比如 The lawyer was too sharp for me 一句，译为“那个律师对我来说太聪明了”就不“确当”，而译作“那个律师太聪明了，我对付不了他”才符合德里达的“确当”翻译标准。(孙秀丽，2008)这里有许多问题需要澄清，但我们只想提出一个问题：假如能够借此例说明德里达笔下的“确当”翻译概念，那么翻译的解构途径与传统翻译方法又有何区别？

我们认为，在解构主义翻译研究的本土化进程中，假如国内译界真的要从中受到某些启迪的话，首先就应该认真领悟德里达思想中的重构性特征，绝不能仅仅取其一端，不及其余，从而将消解当成唯一或最终的目的。关于这一点，deconstruction 一词本身就已经向我们昭示了解构主义思想的实质：消解是前提，建构才是目的。此外，就翻译研究而言，我们应该将解构视为一种独特的后现代思维范式，这一范式中蕴涵了一种多元的开放性思想，借助这种多元的思维范式或开放性思想，才能够在反思传统而不弃绝传统的前提下建构多元的、开放的翻译研究体系。最后，在以本土化为目的的借鉴与研究中，理性的态度应贯穿于整个反思、建构与重构过程的始终，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防止上述过程中有可能出现的种种非理性现象的产生，只有这样，才谈得上解构主义之于我国的译学建设与发展是否真正具有本土化意义上的指导与借鉴作用。

## 参考文献：

- [1] 蔡新乐. 从德里达的翻译思想看理性主义的翻译理论建构[J]. 中国翻译, 2001, (4): 58-61.
- [2] 方灿. 走出封闭 迈向多元——谈解构主义及其对翻译研究的影响[J]. 重庆三峡学院学报, 2002, (5): 37-40.

- [3] 郭建中. 论解构主义翻译思想 [J]. 上海科技翻译, 1999, (4): 4 - 9.
- [4] 郭建中. 韦努蒂及其解构主义的翻译策略 [J]. 中国翻译, 2000, (1): 49 - 52.
- [5] 何加红. 跨越文本的障碍——解构主义对翻译学理论的启示 [J]. 西南民族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9 (增刊): 63 - 65.
- [6] 黄汉平. 德里达的解构翻译理论初探 [J]. 学术研究, 2004, (6): 115 - 118.
- [7] 蒋晓华. 解构主义翻译观探析 [J]. 外语教学与研究, 1995, (4): 64 - 67.
- [8] 蒋晓华, 张景华. 重新解读韦努蒂的异化翻译理论 [J]. 中国翻译, 2007, (3): 39 - 44.
- [9] 金兵. 论德里达的“确当的翻译” [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6, (2): 75 - 79.
- [10] 刘军平. 解构主义的翻译观 [J]. 外国语, 1997, (2): 51 - 54.
- [11] 吕俊. 结构、解构、建构——我国翻译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J]. 中国翻译, 2001, (6): 8 - 11.
- [12] 吕俊. 翻译学应从解构主义那里学些什么 [J]. 外国语, 2002, (5): 48 - 54.
- [13] 钱钟书. 谈艺录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6.
- [14] 孙秀丽. 解构主义翻译思想对外语教学的启示 [J]. 海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2008, (1): 65 - 67.
- [15] 唐述宗. “巴别塔”理论可以休矣——对德里达解构主义翻译理论的再解构 [J]. 山东外语教学, 2004, (2): 73 - 77.
- [16] 王东风. 解构“忠实”——翻译神话的终结 [J]. 中国翻译, 2004, (6): 3 - 9.
- [17] 王宁. 德里达与翻译理论的解构——悼念一代翻译理论宗师 [J]. 中国翻译, 2005, (1): 45 - 47.
- [18] 王守仁. 谈翻译的忠实——读本雅明《论译者的任务》 [J]. 山东外语教学, 1996, (2): 36 - 38, 72.
- [19] 王一多. 解构主义与翻译理论 [J]. 福建外语, 1998, (4): 33 - 35.
- [20] 魏家海. 解构主义与翻译文学的文化误读 [J]. 外国语言文学 (季刊), 2003, (3): 49 - 52.
- [21] Davis, K. *Deconstruction and Translation* [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
- [22] Munday, J. *Introducing Translation Studies: Theories and Applications* [M]. London: Routledge, 2001.
- [23] Venuti, L. Introduction to “What Is a ‘Relevant’ Translation” [J]. *Critical Inquiry*, 2001, 27 (2): 169 - 173.

(责任编辑 马为民)

## “面向翻译的术语研究”全国学术研讨会论文征集通知

为促进术语翻译的相关研究与实践,提高翻译中的术语规范化与标准化水平,推动术语学、翻译学和词典学等相关学科的建设,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中国辞书学会、全国科技名词审定委员会和南京大学联合主办,南京大学双语词典研究中心与《中国科技术语》杂志社共同承办的“面向翻译的术语研究”全国学术研讨会”2010年10月将在南京召开。会议议题如下:1)翻译中的术语及其规范化问题;2)自然科学术语的翻译问题;3)人文社科术语的翻译问题;4)双语词典中的术语及其翻译问题;5)面向翻译人才培养的术语教育问题。

会议诚邀全国各高校术语研究、翻译研究和词典学研究领域的学者,同时热忱欢迎其他与术语工作相关的专家共同探讨术语翻译问题。现开始面向全国高校、研究机构和相关单位征集论文。论文要求结合会议议题,内容可涉及理论或实践问题,可以是学术研究论文或实践研究报告。请于2010年3月30日前提交会议论文摘要(中文500字以内)及关键词,并于2010年6月30日前提交会议论文全文(中文8000字以内,包括参考文献)。会议组委会将邀请相关专家对参会论文进行评审,于2010年9月底前发出正式会议邀请函。

论文摘要及论文请发往: [termtranslation2010@gmail.com](mailto:termtranslation2010@gmail.com)。

联系人: 卜云峰 (18912977049), 耿云冬 (15850511917), 蒋莹 (13675148553)。

南京大学双语词典研究中心  
《中国科技术语》杂志社

(zh-yanhong@163.com), p. 46

Based on Vygotsky's Sociocultural Theory of Mind and the latest development of assessment and writing theories, we have constructed a dynamic assessment mode in college English writing class. It is proposed that such an assessment mode should provide graduated and contingent scaffolding instructional mediation according to the developmental needs of students in the process of writing, thus reflecting the dialectical integration of assessment and instruction, and making it possible to enhance both teaching and the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writing ability.

**Localization of Deconstructive Approach to Translation Studies in China: A Critical Review**, by LIU Quan-fu (qfliu61@126.com), p. 51

Since its introduction into the country in the late 90s of the last century, the theory of deconstruction is becoming a customary mode of translation studies in China. In its localization, however, there have emerged two opposed attitudes or viewpoints. Besides, misreading, misinterpretation and improper use of some of the key concepts, quoting out of context, inappropriate grafting and over generalization have also occurred. Through an examination of some relevant works, the present paper is intended to review critically the theory's localization in China over the years and analyze the rational as well as the irrational tendencies in the process.

**On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of the Forms of Address in Shakespeare's Plays**, by WANG Rui (ruiwang926@yahoo.com.cn) & CHEN Guo-hua (professorchenguohua@yahoo.com.cn), p. 72

Forms of address in plays may suggest the identities of the characters, specify their traits, indicate relationships among them and convey their emotions and attitudes. In translating these forms in plays or other literary works, these functions should be retained as much as possible. The meaning contained or implied in a form of address should be carried over in the translation; a translated personal name should sound like a name in both phonology and meaning; where the target culture or language permit, one English form of address should be rendered into one Chinese counterpart and different forms of address should be rendered differently.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inciples above, the current Chinese translations of personal names as well as *you* and *thou* in Shakespeare's plays could be improved.

**An Eco-critic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Bible: On "Anthropocentrism"**, by ZHOU Ya-li (zhou\_yali@hotmail.com), p. 84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criticism, this paper did semantic and thematic analyses of excerpts from the Bible and elaborated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God, man and environment, in order to refute the opinion held by scholars like Lynn White that the Bible is the source of "anthropocentrism" that has brought about the present ecological crisis, to point out the real origin of "anthropocentrism", and to argue that, from the biblical viewpoint, the ill or well being of environment hinges on the harmonious relationship between God and man, and that ecological problems can be solved only through reconciliation between God and man, through reassertion of "theocentrism" and rejection of "anthropocentrism".

**Thematic Characteristics of Russian Expressionist Literature**, by WANG Zong-hu (wzhxs@sina.com), p. 94

Expressionism is an important phenomenon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literary thoughts with a world-wide influence. As a literary genre, it is unique in theme selection and artistic expression. The themat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Russian expressionist literature are: on the one hand, it explores the same themes as those of the Western expressionist literature—the themes of alienation, existence and rebellion, with differences in concrete present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angle; on the other hand, it is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in themes from the nineteenth century realist literature. The literary object of concern shifts from society to the individual, i. e., towards more universal and abstract themes.

公告：本刊所发表论文收入中国期刊网（CNKI）、万方数据——数字化期刊群和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